

内部资料 请勿转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主办

教育快报

(教育动态)

2014年第8期
(总第359期)
2014年3月24日出版

本期导读

(专刊)

“两会”期间教育热点追踪

教育历来是“两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期从教改之声、热点聚焦、考试改革、教育均衡、学生减负、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八个方面摘录了“两会”期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 缩短学制实施十年一贯高中义务教育
- 拔尖人才是“拔”不出来的
- 建立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实现各种教育学分互认
- 用“两限”抓义务教育均衡
- 给学生“减负”必须小题大做
- 应建立中小学入学人口的监测机制
- 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应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 职业教育走出瓶颈需平衡学历与技术的“天平”



“两会”期间教育热点追踪

教改之声

缩短学制实施十年一贯高中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院长侯一平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修订义务教育法实施十年义务教育的建议”。侯一平在建议中指出，建国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并取得伟大成果的今天，“六三三”学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十二年学制太长，无论是国力和社会承受力都增大了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花十二年的长时间来实现最基础的普通教育了。”

“由于整个普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因此青少年在求学途中有三次大考、两次分流、一卷定终身的考试制度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和突出，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以下矛盾：小升初，成为广大家长的痛，应试教育已经下降到从幼儿园开始；为了应对升学考试，几乎所有的初中只上两年半新课，高中只上两年新课；初中生分流读职高，学生不甘心，家长不情愿；高中与高考捆绑，让义务教育几乎成了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开展全面素质教育的许多良好措施极难推进，收效甚微。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实施十年一贯的高中义务教育来一揽子解决。”侯一平在建议中这样表达。

侯一平表示，十年一贯高中义务教育有水到渠成之势。我国自 1986 年实施《义务教育法》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 95% 以上。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仅是初中水平，与广大民众和社会进步需要的高中教育还有距离，而要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又是目前国力财力条件所不能达到的。如果实施十年一贯制普通义务教育，那么仅仅需要增加约九分之一的财力物力和教育条件就能实现。

摘编自四川新闻网 2014-3-10

高校内部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学院学者学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作出了诸多明确安排，具体到高校内部改革，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认为核心关键在于解放学院、学者和学生三个主体。

目前在高校，学院权力太小，而机关处室则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学院难以自主办学。马敏认为，高校内部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突出学院重心地位，要完善学术委员会并实权化，让教授成为科研和教学的主导者。同时探索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实现以职能部门为主体向以学院为主体的管理转变，将权力重心下移，使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向学院集聚，不断扩大学院自主管理权，让学院能自主干事、干成大事。

马敏认为，高校改革不仅要解放学院，让学院成为办学主体，还应解放教师，使教师成为育人主体，激发教师活力。当前，“记工分”式的考核评价导致高校教师不仅负担重，而且难以潜心治学育人。此外，填不完的表、开不完的会分散了教师太多的精力。为此，马敏建议，高校应积极改革分配机制，按照岗位进行年薪制改革，适当提高从事教学科研人员的收入，再结合学术成果设立奖励制度，让教师有“发呆”的时间，有“做梦”的时间。

马敏认为，“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现在的教学模式将学生牢牢束缚在课堂，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自主空间，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马敏呼吁，高校应加快推进教学改革，解放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把空间时间留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广泛开展基于信息化的自主学习、在线学习、小班化教学和研究型教学，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摘编自人民网 2014-3-12

将中小学政治课改成公民常识课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集宁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提出，应当将政治课改成公民常识课，不要喊那些空洞的理论。

李一飞认为，在教育整个过程中贯穿传统文化教育，公民应以传统价值理念完善和发展自身。我们民族的信仰，应该建立整体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要以传统文化做基础，汲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的素质教育提出多年，却没有很大的进展。很多人不理解素质教育，以为多搞点活动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立德树人，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才是素质教育。从理念上和教学方法上都应该改变，改变成让学生主动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李一飞建议将政治课改成公民常识课，不要喊那些空洞的理论。政治课让大学那些专门学政治的去研究。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加入公民常识课和道德伦理课。空谈政治没用，如果学生认为知识很乏味，就学不好。

摘编自经济观察网 2014-3-4

热点聚焦

拔尖人才是“拔”不出来的

“拔尖人才”是‘冒’出来的，而不是‘拔’出来的。视学生为‘被教育者’的培养机制，

很难让优秀人才‘冒’出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

对记者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提问，龚克直言不讳：“有人试图以深化专业教学和训练培养创新人才，其实工具化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是南辕北辙的。大学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要修正‘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因为创新人才首先应该是高素质的‘人’，然后才是‘才’。”龚克以“博雅教育”为例说：“世界一流大学实行的博雅教育等，其实就是着眼于人的素质提升，贯彻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教育不是要灌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把火。创新型教育模式的形成要在教育理念、管理体制、培养方式等诸多方面下大力气。”龚克认为，大学要真正成为新观念、新知识、新人才的源泉，就必须彻底摒弃功利化的办学趋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大学的使命，也是社会的共同期待，但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创新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创新型人才也不会在一朝一夕涌现出来。所以解决‘钱学森之问’不能这么着急，只要大家静下心来踏踏实实搞教育，提高学生素质，就一定会出优秀人才。”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4-3-13

超级中学是教育癌细胞

超级中学是否真那么传奇？中国获那么多奥赛金牌，咋就没从中诞生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全国人大代表、安阳一中校长黄艳认为，“超级中学”就是教育的“癌细胞”，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对教育的“闯红灯”行为实行“零容忍”。

有这么一批学校，不仅能“批量”生产状元，还会囊括全省的高分考生，这些“神一样存在的学校”在我国并不少见，被教育界称为“超级中学”。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学校都是“逆袭”成功的典范，每年朝圣者无数。然而，在黄艳看来，“超级中学”就是教育的“癌细胞”，并在不断地恶性增殖、膨胀。“有些‘超级中学’通过强拉生源‘起家’”，她直言，这种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家都没办法按教育规律办学。在她看来，除了抢生源，“超级中学”还通过励志口号、题海战术、控制“三闲”（闲思、闲心、闲话）方式，将学生培养成做题机器。那么，到底怎么治理“超级中学”？她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及时出面，将‘神校’拉下神坛，使教育回归自然与真实。”

摘编自大河网 2014-3-5

研究生已泛滥成灾 当反思教育积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表示，中国的研究生规模必须控制，在过去10年间，中国研究生规模增长了约10倍。可以说，研究生群体已经泛滥成灾。

当前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人才浪费的问题突出。研究生虽然学历层次高，但是由于目前研究生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导致研究生没有从事与其学历、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另外，师资队伍建设并没有同步跟进，高校学术腐败、导师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数据显示，我国每位博导平均带 5.77 名博士，比例远远高于国外大学。

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就业不理想，研究生俨然成了一块注水猪肉。若高校为了暂缓就业压力，继续扩招研究生，显然不可取。“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师也”。显然，改良高等教育生态，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研究生教育由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华丽转身，显得迫切而必要。如果不下力气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整学科、产业结构，一味扩招研究生应对就业难，可能造成更大的就业矛盾与社会问题。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4-3-3

终结大学生就业中拼数字、拼爹妈、拼运气现象

高校就业率拼数字闪现出虚假繁荣、大学生找工作“拼爹”制造新的不公、工作好坏全凭拼运气破坏了教育本质。面对 2014 年即将来临的严峻就业形势，代表委员们期待打碎大学生就业各种“拼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专家朝克说，有的高校出于生存需要，诱导学生就业造假，而教育主管部门出于政绩需要，往往也不会主动严查就业率造假。国外高校是在学生就业一年后再进行就业率统计，统计口径非常严格，由人力资源部门或第三方评价机构操刀。“希望就业统计回归到以就业质量为标准，这样才会倒逼学校调整专业和招生制度。”

“拼爹”就业虽然相对于整个高校毕业生群体微乎其微，但其影响不容小觑。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说，我们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呵护好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起点的公平，更要逐步实现好工作在体制外。“希望‘唯才是用’的新风能够吹起来，让个人奋斗成就梦想成为年轻人的信仰。”黄德宽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集宁一中校长李一飞说，入口不正确，当然会导致出口难，就业难的症结要回归到整个教育体系中来探讨，只有教育回归本质，才会实现就业从容。教育本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现实却都在拼分数，什么对考试有用就学什么，什么专业成本低就开设什么，至于能不能就业，全凭学生们去拼运气。“希望初等教育阶段学生可以学到常识，大学能够学到受益终生的技能，这些能力会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帮助个人更好地成就自我。”

摘编自新华网 2014-3-13

考试改革

高校校长谈高考改革：关键在高校有更多择录权

高考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考”。本轮高考改革被认为是继 1977 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具革命意义的一次，提出“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等机制，旨在打破被诟病多年的“一考定终身”。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谈及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时认为，改革最关键在于高校应有更多择录权。“只有把自主权交给高校，才有可能保证改革的成功。”陈骏认为，本次改革方案借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招生制度、录取经验，但前提是，美国高校录取自主权很大。考核中很多指标很难量化，不能量化如何评判成绩高低？只有把自主权交给高校，高校根据实际情况择录。在公平录取问题上，陈骏认为，高校作为录取的主体，政府、社会要给予监督，怎样形成三者关系，这很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则提出，望能建立“多投多录，高校、考生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东南大学校长易红认为，是否能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关键在于是否能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有利于受教育者的成长、选拔人才、促进公平。易红表示，取消高考是不可想象的，高考改革应是渐进式的，且考虑到差异化问题，应允许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做法。

摘编自人民网 2014-3-5

考试改革第一要确保公平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在做客人民网教育频道时表示，考试改革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制约整个教育发展的一个牛鼻子。高考改革第一仍然要确保公平。要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给学校和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能够让更多的人、创造性的人才得到发现、受到重视。

如何突破招生考试的瓶颈问题，朱永新认为，在命题的科学性上，除国家命题以外，省与省的命题水准参差不齐，每年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缺乏一个科学性的机构。朱永新建议通过引入第三方、民间的机构参与到国家考试中来，保证命题结构、水准的稳定，逐步形成比较科学的考试，建立真正发现人才的考试。

从录取方式来说，需要更加公开、更加透明，过去往往是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少数人来进行招生，今后希望有社会的监督参与，这样确保学校能够公平、公正地录取学生。另外，给学校更大的录取自主权。无论从考试本身、录取本身，都需要有很多从技术层面到政策层面的突破和变革。

高考改革将改“死读书”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时说，这是不同教育中转阶段的关键点，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

龚克认为，作为考试招生制度中的重头戏，高考改革应转变为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成绩测试基础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这四个关键词是高考改革的重中之重。他认为，首先统一高考是要坚持的，不是废除；第二是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纳入到大学的录取招生中，过去我们只看高考成绩，高中其他所学东西在高考录取环节里没有体现，这影响了高中乃至初中、小学阶段的素质教育；第三是综合评价，过去的高考测量不了综合素质，在大学发现了很多问题，不能反馈到高中去；第四是完成综合评价之后还有多元录取，不是一元化录取。多元录取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适应了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不同专业对学生不同能力和特长的多元性要求。多元录取与现行的一元录取制度相比，更科学、更人性。

龚克认为，这样改革以后，会更加适应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因为从教育角度来讲，它是要启迪学生的学习。现在高考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死读书，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强调熟练性、准确性的东西太多，而思辨性的东西，通过联想、通过比较去把握的思考性的东西偏少。**龚克**同时强调，现行高考虽然在很多方面广受诟病，但其公平性是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这就意味着高考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改革后如何保证高考的权威和公平，如何做到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又保证录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公正。

摘编自新浪教育 2014-3-14

澳区人大代表联署建议:全面取消小升初考试

6名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李沛霖**、**容永恩**等联署建议，改革国内应试教育现状，提出全面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并改变单纯以升学率和学生考试成绩作为学校与教师绩效评核的标准。

澳区人大代表关注到，国内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虽然减负呼声一直不断，但收效甚微，教育评价仍以分数说话，考核内容不少脱离实际，考评方式呆板乏味，教师追赶教学进度，资质差一点的学生更要自行课外补习。

因此提案中建议，要全面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减轻学生负担，中考和高考出题应关注基础、能力、应用和创造力，而不是用难题、偏题或怪题来挫败学生。与此同时，建立和完善学生评价机制，使教育评议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和恒常化，并建

立多次评议及多元评核制度，避免“一试定终身”弊端的出现。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则应改变单纯以升学率和学生考试成绩作为绩效评核的标准。澳区代表认为，不改变现行的考试制度和评议制度，只靠减少上课科目或时数、压缩在校时间、减少家庭作业，可能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滋生一系列新问题。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4-3-14

建立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实现各种教育学分互认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建议，探索建立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和国家考试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继续教育‘学分银行’和国家考试公共服务平台能实现各种教育形式学分互认，是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徐玖平认为，这一建议的实现是有基础的，因为自学考试有国家统一的专业和课程标准，实行完全的学分制度；同时，有严格的国家考试制度，有灵活开放、富有弹性的学习方式，有广泛参与的社会助学系统。

为了确保考试质量，徐玖平建议坚持统一的专业管理制度、考务考籍管理制度、命题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应全面提升自学考试国家题库的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命题质量和水平，注重培养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个人学习与职业发展提供服务。”徐玖平认为，还应加强自考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的改革，打破唯分数论，积极探索开展综合评价；实现从以纸笔考试为主向纸笔考核与实践考核并重转变；探索开发个性化、多样化的考试评价服务，为个人学习与职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

摘编自四川新闻网 2014-3-10

教育均衡

用“两限”抓义务教育均衡

“就近入学是为了避免择校，但教育均衡问题解决不好，是否会面临择区、择房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建议政府用“两限”等方式抓好义务教育均衡。

“教育部的这个方案刚出来，就造成了学区房价格应声而涨。这说明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不做到基本均衡、公平，就近入学也很难解决根本问题。”葛剑雄说，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两个学校差距很大，谁不愿意上好学校？有钱的可以买学区房，有权的用权或是“走关系”，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对此，葛剑雄建议国家要下决心把义务教育均衡问题抓好。一方面，政府要公布国家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葛剑雄说：“最低标准包括，多少学生必须配一名教师、

多少学生有一个运动场地……这个标准可允许地区之间稍有差距，但标准必须要公布出来，让社会监督。”同时，义务教育也要限高，比如对师资、设施等方面过高的情况，今后可以通过减少投入，逐步将目前的差距拉平。

此外，**葛剑雄**还建议，在做不到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允许民资、外资来办特殊学校，以满足部分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他说：“对此，大家不要眼红，这也有利于教育的发展。等到国家真的把教育做到均衡后，这些学校也很难生存。”

摘编自千龙网 2014-3-4

全方位多角度治理择校热

“择校热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增加了群众教育支出，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要全方位多角度治理择校热，让孩子们享受优质均衡教育资源。”**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太原市委主委、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建荣**建言。

导致择校热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学校建设滞后，难以“就近入学”；优质资源短缺，舍近求远择校；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公参民”学校加剧了择校热等。**傅建荣**说，建议出台政策，要求新建、扩建、改建住宅小区应当按标准配套建设中小学、幼儿园，并与住宅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使用；按照国家规定的中小学服务半径标准，建设义务教育学校，保证学校随着小区建设而建设，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并将此项工作作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同时，加强措施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学校，让这类学校参与“就近入学划片分配”。

摘编自《山西日报》2014-3-6

对新建公办民办园所给予同等支持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改革进行多年，取消了重点校、示范校，实施教育公平划片入学，但学前教育阶段仍然在大搞评级评类：省级示范园、市级示范园、一级一类，并按级类进行补贴。民办园同样也在为国家、社会、家庭培养孩子，应该在政策上、经费上给予支持，**全国人大代表、精英集团董事长翟志海**建议按生均统一划拨经费，对新建公办、民办园所给予同等支持，享有同等的拨款与补贴。这样才能降低民办园过高的经营成本，让老百姓上得了民办园，能放心上民办园。他同时建议，民办幼儿教师纳入教师系统，并与公办教师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包括在纳税、社保、职称评定、退休待遇等方面的公平机制，稳定民办幼儿教师队伍，使其安心民办教育事业；建立幼儿教师的流动制度；公办园每年抽出一定比例的师资力量向民办园流动支教，实现优质师资共享，促进教学交流，提升民办园教学质量。

翟志海指出，幼儿教育是以教会幼儿生活自理、培养好的性格为主，没有必要人

为地将幼儿园分成三六九等，进行评级。他建议取消现行的幼儿园评级制度，同时取缔原有被评级幼儿园“级类”称号，逐步恢复已失衡的教育公平。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4-3-13

学生减负

给学生“减负”必须“小题大做”

全国政协委员孙惠玲表示，给学生“减负”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众多因素叠加，层层传递到学生，形成了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减负”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共同的责任担当，要建立责任分摊机制，必须“小题大做”。

孙惠玲认为，综观各级教育部门已出台的众多关于“减负”的有关规定，有两点应引起高度关注：一是“减负”令大同小异，都注重从“减”上做文章，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降低教材的难度、减少考试的次数、减少作业量等等，但对“减”后如何增效缺乏指导；二是“减负”已经在教育系统内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由于缺乏配套政策和社会联动保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情况屡见不鲜。

对此，孙惠玲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导向，改革考试与入学制度及学校教育资源的配给制度，提升教师的待遇，同时加强就业导向，就业不再唯学历论；教育系统切实落实育人目标，纠正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社会和家庭应整合教育力量，改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同时强化家庭教育。同时，孙惠玲指出，学生的社会角色和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承受一定的、合理的、有一定质与量的学业负担，这些学业负担能够促进他们发展，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前提。

摘编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4-3-6

课程多负担重 代表建议以整合促义务教育改革

“现在小学课程门类繁多，国家、地方和学校自身的 10 多门课程分布在每周五天，对 6-12 岁的学生来说，名目太多，负担重，书包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说，由于课程门类多，分科细，课程设置比较僵化，各学科内容存在交叉重复的现象，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年段也有重复。这种现状导致学生在校时间被挤得满满的，效率却不高，所以有的孩子会觉得负担重或者不爱上学。在她看来，对以形象思维和直观思维为主的小学生来说，更适合综合学习。因此她建议，通过课程整合促进义务教育中管理方式、教研方式的改变，特别是教育教学环节的改变，以课程整合推动义务教育的综合改革。“对小学来说，五六门课程足够了，可以按照类

别划分和各学校实际进行课程归并整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刘希娅说。

重庆谢家湾小学近年就进行了先行的教育改革，原有的 10 多门课程被整合为阅读与生活、数学与实践、科学与技术、艺术与审美、运动与健康 5 门课程，其中阅读与生活整合了语文、品德与社会、英语、生活艺术等。刘希娅介绍，课程整合后不仅没有降低国家要求的课程标准，没有减少课程时间，还给了孩子们更多选择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学习空间和平台。“学生们上午进行以国家课程为主的基础性学习，下午就是个性、特长、综合素质发展，或选修感兴趣的社团活动。”刘希娅说，现在学生们下午 4 点左右放学，比以前提前了一个小时左右。

摘编自华龙网 2014-3-6

教育管理

为随迁子女提供梯度教育公共服务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外来人口持续快速涌入，教育资源日趋紧张。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胡卫表示，教育公共服务不能仅仅以户籍为依据，必须考虑逐步向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外来常住人口覆盖。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人口管理制度，根据城市的教育资源状况，提供梯度式的教育公共服务，做到有效覆盖和有限覆盖相结合。

“为此，各大城市要加强对区域内教育需求的预测，了解区域人口出生和流动的变化趋势，统筹配套教育资源。”胡卫说。他建议各特大型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分层、分类、有梯度的教育公共服务制度，向不同持证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相应类别和水平的教育公共服务。对于“稳定就业、稳定居住”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无条件提供义务教育服务，逐步向其随迁子女开放高中，有条件地提供高中阶段教育服务。可以采取综合考核制，将父母的条件与子女的学习情况综合起来进行考核。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4-3-7

应建立中小学入学人口的监测机制

根据专业教师在编需求调查，北京小学缺口达 47%，初中缺口达 68%。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参加北京团审议时表示，应对入学高峰，应建立北京中小学入学人口监测机制，建立新教师补充机制。

吴正宪表示，在北京常住人口中，当前入学高峰问题必须引起注意。相关部门调研显示，金猪宝宝、奥运宝宝扎堆出生，现在他们陆续进入幼儿园、小学，加上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在京接受教育，使得入学人数激增，教育需求高涨，给北京中小学资源承载力带来一系列压力，最突出的是师资数量的压力。

吴正宪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发布后，预计北京未来入学人口将逐年增加。此种情况下，新教师供应不上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新教师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她建议，面对北京入学高峰的到来，建立中小学入学人口监测机制以便科学预测入学规模，并建立教师队伍建设的数据库和需求预测机制；扩大市属高校招生培养规模，比如北京师范生，合理调整专业结构。

摘编自《京华时报》2014-3-13

高等教育

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应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占芳建议：延迟毕业生双选会时间，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提前找工作让大四变成了“混日子”。刘占芳认为，不少高校毕业生“质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大四就开始找工作，4年的学习时间缩水为3年。刘占芳注意到，他的学生一进入大四就开始频频参加各种双选会，有的学生甚至逃课去找工作。刘占芳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已经不是一两年了，需要从制度上重新安排——建议教育部调查研究后，将高校毕业生的双选会调整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研究生的双选会也安排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现象亟待改变。“提高高校教育质量，还在于去行政化。”刘占芳说，高校去行政化提了多年，但推进缓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他列举了一种流行说法：高校一开大会，“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高校行政化已是普遍现象，破坏了高校学术氛围，制约了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学校的重心在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高校不能在行政和教学科研上‘双肩挑’”。他建议，针对不同高校的定位和特点，应该实施分类指导，以法规确定高校职能部门机构设置，限定职数，同时制定此项改革的时间表。

把高校教师的精力引向课堂。“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就是要把高校教师的精力引向课堂。”刘占芳说，一些高校教师热衷“下海”办公司，获得经济效益，高校的商业化色彩也影响到了大学生，破坏了高校的学术氛围。另外，侧重科研的考评制度，也分散了教师对课堂的热情。他建议，国家应该把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改革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从提升高校课堂质量和效率入手，让学生学有所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回归教育机构的本质属性。

摘编自中国在线 2014-3-5

大学要具有培育大师成长的土壤

同世界上很多一流高校相比，为什么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大师匮乏症”？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长傅永春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大学还不具有培育未来大师的土壤。

傅永春说，大师的成长虽然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否为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特别是作为高层次人才聚集的大学，能否构建一个适宜于各类人才持续成长发展的大环境，使具备成为大师条件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深入地开展研究和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是大师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基础。

在谈到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困扰时，傅永春说，我国高校在人才选拔方面存在很多体制机制弊端。统一模式、统一标准甚至统一量化的考核方式使人才培养和成长呈现批量化特点，丧失个性化。有关单位的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管理指导评价方法，比如用计件式方法来衡量科研人员的工作业绩等手段，都不适合出大师。这些简单粗放的人才工作制度和机制弊端不破除，大学就很难担当造就大师的重任。只有牢固树立全面优化人才环境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为最广大的教师提供更多更好的能够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平台，那么具备成为大师潜质的人才就能崭露头角。就目前来讲，积极培育大师成长的土壤是我国高校提水平、上层次，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当务之急。

摘编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3-14

高等教育要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提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需要大量的学术型高端人才，更需要一大批从事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应用型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目前还存在着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必须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摆在重要议程。

一是以高校转型发展、分类建设为突破口，着力解决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专业设置趋同、课程内容陈旧、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等突出问题。

二是引导地方高校加快推进综合改革。要建立健全面向市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组织行业部门和协会参与办学指导、人才供需监测、专业设置和评价。

三是建立相应的办学评估和政策支持体系。要继续借鉴国外应用技术大学的做法，探索建立专业的应用型本科办学评估体系。国家应制定财税优惠政策，支持高校加强实践教学、师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校企联合开发等。

摘编自人民网 2014-3-9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走出瓶颈需平衡学历与技术的“天平”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快，但是相比较而言，技工和高级技工的培训相对落后，而很多工程技术、工厂企业里缺乏的恰恰是这部分人才。现在很多公司不缺设计人才，甚至设计人才人满为患，而优秀技术工人却是难得一见。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技术工人招工难，学历与技能两相对比的结果强烈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职业教育在中西方为何会有巨大的差别，一方面原因就出在文化认同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学而优则仕。“所以现在的孩子能上高中不上技校，能上大学不上高职，能进办公室不去操作间，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觑。”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韩军说。

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对思想观念的转变甚至比技能培训更加重要。现代职业教育要将“观念的转变”纳入到发展内容当中，让年轻人有认同感和满足感，职业教育受冷落的现实才会好转。另外，政府还应在国人所重视的“学历”上加以引导，确保职业教育“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现在的职业教育，到中等层次就结束了。未来可不可以有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可不可以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甚至还有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层次的职业教育，为中国的职业教育打通一条上升通道，引导国人尊重、看重职业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涛说。

摘编自国际在线 2014-3-7

职业教育也要有硕士博士 搭建起培养的立交桥

“不仅要有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有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而且也要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还要有专业硕士、专业博士。这一体系搭建起了职业教育的‘立交桥’”。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毛杰说，这样才能够培养更高端的应用型人才，这样的人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的能力，也能够有创新能力。

毛杰认为，做好职业学校学生就业，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社会地位，是转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搞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未来培养数以亿计的建设者的必由之路。“要改变把职业教育从整个教育体系割裂出来的现状。”毛杰说，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而不是一个层次。中等职业教育是中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体现。“提倡中高职相衔接，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不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这样一个简单的学校升格过程，而是要打通

职业学校学生的连贯培养。”

毛杰分析说，目前很多高校追求教育层次的提升，但在教育类型方面只注重了理论的学习，对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重视不够。所以在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技能较差，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因此，一方面建议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规格方面要尽快适应岗位、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建议各地要专门建立针对本科生的职业教育培训基地。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2014-3-6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能等

“高中阶段是认识自我的主要时期，是职业生涯规划形成的关键时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从高中生抓起。”谈起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刘宏艳显得很着急，“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仅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不能再等。”

当前的高中教育，学科知识的传授占据主要地位，许多高中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将来适合从事什么职业，高考填报志愿时常常犹豫不决，甚至出现盲目跟风。另一方面，高中阶段的学生人格类型刚刚稳定，在这个时候发掘其职业潜能，制定一套长远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将使其终身受益。

刘宏艳建议，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指导机构，负责做好指导、管理和督导工作，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指导建议性文件，对职业成熟程度、职业指导内容、考试及评估等方面做出规定，以法律形式保障其全面实施。同时，政府要增加资金投入，建立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资源库，出版教学辅助材料，并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纳入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另外，还应将“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门课程引进课堂，利用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平台，让学生随时随地获得职业体验，也可以开设讲座，请成功人士、企业管理人员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增进学生对职业和自身的认知。

摘编自东北新闻网 2014-3-7

北京教科院教育信息中心 李志涛 采集整理

责任编辑：商发明 邹敏